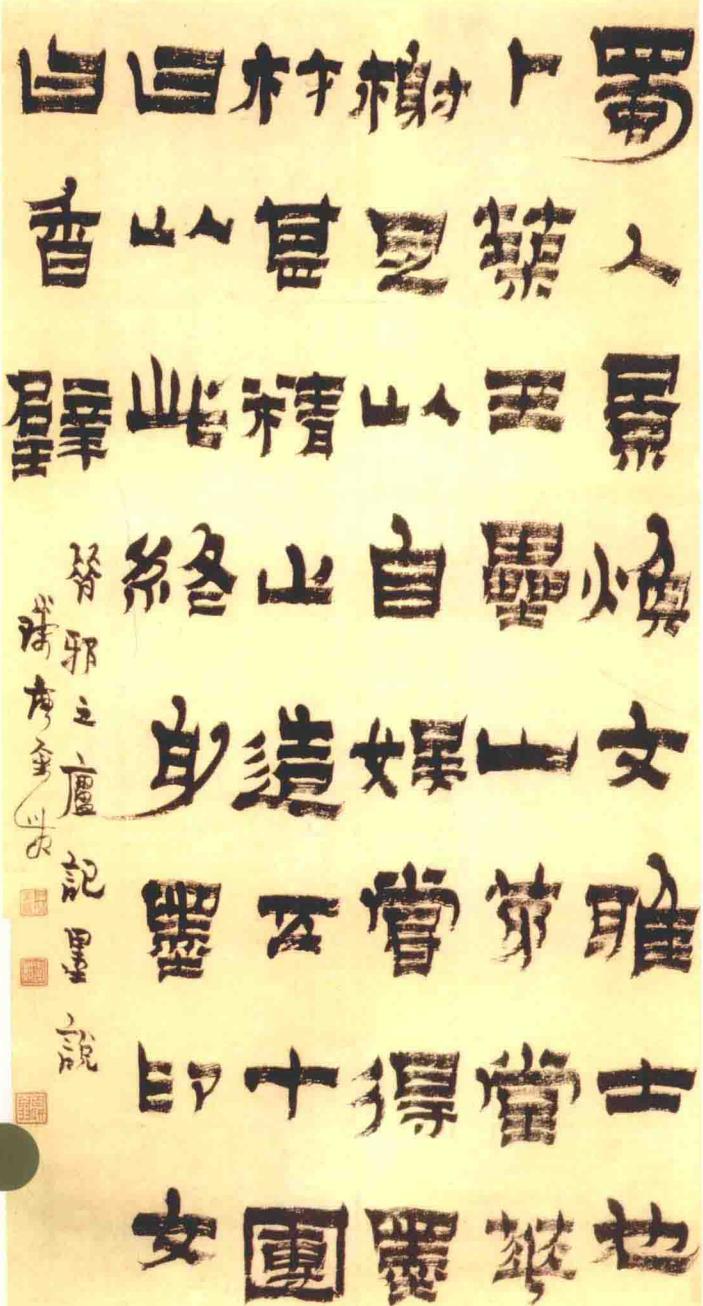


清代隶书要论

Essentials of Qing Dynasty
Official Script

王冬龄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王冬龄 书法著编丛录

清代隶书要论

王冬龄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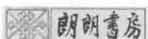
清代隶书要论/王冬龄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2

(王冬龄书法著编丛录)

ISBN 978-7-300-20563-2

I. ①清… II. ①王… III. ①隶书—书法—美术史—中国—清代
IV. ①J292.11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03055 号



王冬龄书法著编丛录
清代隶书要论
王冬龄 著
Qingdai Lishu Yaolu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51906350
编辑热线:010-51906345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5 mm×24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17.5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31 000 定 价 49.80 元

致读者

王冬龄：心手同畅，自成书道

呼延华 钱午骏^①

—

宣纸深处发出神秘而迷人的声音。

西湖之滨，王冬龄。巨幅草书《心经》书写现场。

杭州，非凡凡响的城市，王冬龄用这片土地赋予的力量，谛听着历史深处的召唤，在数千平尺的宣纸上，他立身于一个宏阔的艺术世界，让心灵和着大地的脉搏，笔走龙蛇，翩然起舞。

时而深沉时而轻快的节奏，气势过人的旋律，书法的纯粹之美，技巧准确，既不过火也不拖沓，几无偏失……浓淡枯湿，人书俱老。一个江南书法家源自古典的温和细腻，与一个当代艺术家源自创造的热情奔放，融为一体。

自 1987 年创作《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开始，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王冬龄创作出一幅幅震撼人心的作品，雄辩而精妙地，在形式和精神上，体现了中国书法和经典文本的精髓。他充满感性的艺术语言，恰似自己创作的清唱剧，个性卓绝，哲思飞扬。这情思弥漫的个性化，分明对这个艺术世界深具意义。

把王冬龄先生放在一般的书法家中进行比较或评论，大概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样的概念对于他以及他的作品来说，显得太小了。

我更愿意称他为当代艺术家，一个具有浪漫情怀的艺术家。

^① 呼延华，独立出版人，北京朗朗书房出版顾问有限公司总编辑。本文系集体讨论的结晶，朗朗书房编辑党明放、王佳碧、田渊、钱午骏、王雨薇，均对此文有所贡献。

二

今天，王冬龄几乎成了一个现象般的存在。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他立足杭州，在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纽约、东京、巴黎、伦敦、汉堡、柏林、悉尼、首尔、里斯本……举办和参与了难以计数的作品展览、现场演绎和学术研讨。那形散而气聚、笔飞而神凝的大字书写和现代性十足的抽象水墨，在国内佳评如潮，在海外则往往引起关注，数不清的赞叹和评论纷至沓来。

三写《逍遥游》，形迹殊妙，意态万千，深邃思考，尽付毫端。他将书法中的“心手同畅”与哲学中的“无为逍遥”相契合，而让两种境界相联的，是那具有现代性的书写现场，他向在场者展现了人笔纸墨高度契合的东方境界。

大字狂草《老子·五千言》，下笔狂恣跌宕，纵横不羁。时若浪破天门，一泻千里；时若羚羊挂角，起落无痕；时若风过竹林，摇曳生姿。洒脱飘逸，自成书道。王冬龄在成就《老子·五千言》这不世逸品的同时，作品本身的艺术性，也造就了王冬龄独立于书坛的创作姿态。

狂书巨制《心经》现场，王冬龄随心所欲，将《心经》中的“清净心”与最具抒情意味的狂草结合在一起，饱含着开放性和随机性的沟通立场，给在场者带来屡屡不绝的视觉冲击力。这次创作，彻底激活了王冬龄艺术修养的四个维度——传统的扎根、现代的沟通、当下的激活、个性的坚持——这四个维度，各自支撑着王冬龄艺术世界的一端。

信手万变、逸态横生的“体书”、“乱书”和“银盐书法”，是王冬龄融会西方现代艺术的独特创造。他不依赖（语言的）能指与所指，而是通过线条运动的节奏和微妙状态，直击和反馈艺术家的心灵世界。这种直击和反馈，重新标定了中国书法在当代艺术中的位置。

从以心求道的谨慎自持，到道心相映的从容自得，王冬龄以大字书写和抽象水墨为核心的现代艺术，散发着水击千里的艺术气息，透射出“无为而无不为”的悟道觉证。在人生中寻找艺术，在艺术里感悟人生，是王冬龄对现代书法的执着之因，也是他厚积薄发、不为世移的艺术品格。

奇逸溢满纸上，辉光映目浸怀。先生的作品，会让对立者和解，会让紧张感消除。阅读和欣赏过程中，一种大道自然的感觉，总是萦绕在观者心中。他坚持

载道于无心，不为人迁，从不去迎合那个广泛追捧他的所谓的市场。他的作品的诞生，有当代中国艺术独树一帜且意韵丰赡的一面。从容和气度沛然其中，神思从，物我两忘，无滞无碍，有自由腾耀灵魂，有情怀回肠荡气。

三

笔架砚池辞海，诗华墨雨书林。先生对现代书法和现代艺术的钟情，显然与在美国四年的讲学经历须臾不分。激赏杜尚的他，拥有与杜尚一样直追艺术本质的犀利和老辣。西方现代派艺术家凡·高、马蒂斯、波洛克等人的创作理念，让他心动不已。他重新审思中国书法的现代转型和当代定义，让中国书法在现代国际艺术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他近三十年来的艺术自觉与人文担当。

老笔纷披，气韵浑然。毫无疑问，王冬龄并不仅仅是一个当代艺术家，更是一个传统书学根柢深厚的书法家。

陆续受教于沈子善、林散之、陆维钊、沙孟海诸先生，中国美术学院第一批书法硕士研究生，令人瞠目的传统教育经历，使王冬龄永远无法忽视和割舍那浸润极深的中国书法的历史丰碑。年近古稀，他仍然以临习为要，以至于《古诗四帖》《龙藏寺碑》等传统碑帖成为他一生的临习功课。《王冬龄书法艺术》（荣宝斋出版社，2007）收录的《道德经》《金刚经》《心经》等小楷作品，以及先生时常书于报纸、照片、海报、书扉、扇面、丝绸上的篆隶楷行草等各种书体，或超凡脱俗，或空灵有致，或潇洒神怡，或隽秀绵邃，一帧帧功底深厚、冠冕群流的传统书作，其实同样是他内心最深的眷恋。

当年，启功先生听闻王冬龄做现代书法，曾经表示惋惜与不解，但启老又在1995年为王冬龄策划的“现代书法双年展”欣然题写展标。这种惋惜和厚望都充分表明，王冬龄的书法艺术——无论传统修养还是现代探索，业已获得一代大家的首肯和认定。

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王冬龄所思索的，是中国书法的当代命运和艺术方向。在这个当代艺术沟通无碍乃至零距离交融的世界里，中国书法何为，是踽踽于对传统的守望，还是寻求在当代艺术格局中的突围，这里有王冬龄对中国书法孜孜

不断的深思和浓郁的情感。在不断尝试、不断突破甚至不断冒险的创作征程里，先生心如静渊，明澈之中，映照时代的深沉昭然在目。

先生以纯粹的内心诉求和艺术禀赋，致力于达到超乎个人感觉之上的境界，他对自己所有的作品，都赋予相当深度的情感。我觉得，当代许多艺术家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将内心感受和思索的可能性，实现为一种海阔天空般的想象力所能达到的广度与深度。

于瞬间抵达永恒，于当下追溯远古。王冬龄用他的如椽之笔，带领我们走进艺术的大美之境。

四

王冬龄先生是自己艺术世界的主人，他手中的笔听从于心的呼唤，栖居于天地间而怡然自得。

当周围的世界都倾向于通过增加复杂性来博取眼球时，当许多所谓的艺术家都在霓虹灯或广告牌上，向天下宣传自己的作品时，王冬龄却以“见素抱朴，知黑守白”的极简精神，静心沉醉于艺术教育的授业解惑之道。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硕士毕业后，王冬龄在该校任教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带学生，编教材，作专著，桃李满天下。在创作和展览之外，他著书立说，几不停辍。辑入本次出版的《王冬龄著编丛录》凡十卷作品，是先生积数十年之功所思、所感、所悟之精品。

《王冬龄谈名作名家》：释析名作名家艺术风格，旁征博引，见微知著。《王冬龄创作手记》：内心独白，笔墨源自心性。道不远人，书道常新。《王冬龄谈现代书法》：认识是创作的起始，深思卓识是真正艺术家的创造之基。《清代隶书要论》：独创“清隶九家”一说，切中隶书微言大义。《中国书法篆刻简史》：择取历代名家，碑帖并举，如数家珍，要言不烦，鞭辟入里。《画人学书要义》：立足传统，着力实践，在书画关系中探求画人学书之道。《书法范本经典》：分析风格特点，点评临习提要。旨趣深弘，意蕴妍雅。《中国书法的疆界》：艺术思想的美妙组合，不同的立场和维度。《中国书法名作大典》：中国书法艺术图鉴大典，上迄

殷商甲骨文，下止现代书家作品。《书非书》：妙论雅集，慧心自明，以此洞见一个中国艺术家的高度和成就。

五

不能为学，何以为艺？王冬龄是纯粹书法艺术的推动者和激励者，十卷作品掷地有声地表证了王冬龄对书法创作和艺术教育的推动。他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现代人自由的情感，在中西之间，在校园内外，做展览，事交流，著书立说，解惑励人，坚实行走在一条守恒而恰到好处的艺术道路上。

完美无瑕的大师寥若晨星。无论是初窥堂奥的观者还是艺术领域的行家，都对这位西湖之畔守望瀚海的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给出了非同寻常的尊敬。

立足古典，生发现代。王冬龄以屹立书法高峰的超然状态，弥合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成为一位真正的中国书法家，一位冒险探索的当代艺术家，一位有学术观念的艺术教育家。

关于对王冬龄先生及其作品的评价，在本次出版的《书非书——王冬龄艺术评论辑要》一书里，许多专家学者从多个角度进行了不同层面的论述。甚或，王冬龄先生本人的撰述或作品，也许比任何评论，更有说服力。

先生博通上下，雅趣古今；先生砚池墨韵，神融笔畅；先生任情设景，千态万状。四十余年的究心思考，融汇十卷皇皇巨著，毕两年之功，编纂甫成，比较先生铺陈于前的艺术和学术成就，情不自持，辄就所知，敢告大略。为序诚惶诚恐，权作“致读者”，并求教于方家。

2015年9月
写于北京朗朗书房

自序

感恩书法

王冬龄

2011年10月，在朗朗书房的策划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三本书，即《王冬龄谈名作名家》《王冬龄创作手记》《王冬龄谈现代书法》，社会反响还不错。2013年11月，呼延华先生找到我，希望能将上述三书修订，并与我有关书学方面的其他著编文字一起集成丛书，我欣然同意。尽管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对丛书作了必要的润色修改和大量的补充增订，但仍感到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现在出版在即，颇有几分忐忑，著编如有不当和疏漏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关于这套“著编丛录”各书的情况，在此说明如下：

《王冬龄谈名作名家》于2011年初版时，收录了我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名作名家的个案研究和辨伪析疑等方面的文章，以及我之后所提出的“二十世纪十大书法家”之说。其中，《张旭〈古诗四帖〉真伪初探》颇费心血。

《王冬龄创作手记》于2011年初版时，收录了我多次巨幅大字重要创作的心得体会，关于草书创作和对草书现代表现力等方面的全面阐述，以及近三十年我对书法的重新认识和深层思考，附有部分访谈录。新版增补了数篇2012年以后的创作手记，以及有关我私下月程月要的功课揭示对话录。

《王冬龄谈现代书法》于2011年初版时，“现代书法”一词在学术界、书法界争议尚大，但我们仍坚持此“约定俗成”之说。其中所谈并主张的现代书法艺术理念，是我自己实践探索的体悟和思考。

《清代隶书要论》是在我1981年硕士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增补而成，曾由上海书画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现略加修订。对清隶专题做深入系统的研究，从书学

领域来看，或许我是先行了一步。当时，沙孟海先生对此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许。

《中国书法篆刻简史》缘于1983年参加王伯敏先生主编的《中国美术通史》，其时，由我所撰写“书法篆刻史”部分，山东教育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今抽出该专题作为专著，除补充部分书家简历外，未作更多的改动。

《画人学书要义》，是在198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画人学书概述》的基础上增订而成。原书陆俨少先生题签，王伯敏先生赐序，对二老曾给予的奖掖与厚爱，我心存感激。两位先生先后作古，聊表敬仰与纪念。

《中国书法的疆界》由中国美术学院现代书法研究中心在2004年和2012年征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先后出版的《中国现代书法论文选》一二集选编而成，其中同一位作者有两篇的，选取精华的一篇。感谢这些专家、学者始终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宽广的学术胸怀所贡献出的可贵的学术观点。

《中国书法名作大典》原为广西美术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我为主编，蒋进、韩天雍、张爱国、金铮为副主编，并邀请了王异、何连海、李晓明、张波、张冬冬、李晓林、周振、周政文、宫秀芬、钮利刚、唐楷之、韩伟、曾庆伟等参加了编写，历时一年完成。当时是希望这部以书法符号为主的图录，不仅能供书法专业人员使用，同时也能成为设计及其他艺术门类读者的图像参考书。这次出版，在原有的基础上，除对原版图注进行了严格的校点和规范外，又增补了名家名作五六十幅，并订正了原书中所出现的人名、地名和作品名称上的错误。又因书中图版涉及书家简介，这次除了进行大幅度的增写外，又作为附录，以汉语拼音音序排列在后。如此修订，显得更加符合初衷。

《书非书——王冬龄艺术评论辑要》是由朗朗书房提议新编的。书中收录了近十多年间国内外专家、学者、批评家以及观众对我艺术创作的评论和观感，可以说是一部对我迄今为止艺术创作和探索成果最全面、最权威的评论文集。

除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先后出版的《中国书法教程·书法艺术》、高等艺术教育“九五”部级教材《中国艺术教育大系美术卷·书法篆刻》，我有关书法艺术的文字基本收录于这套“著编丛录”之中。

西汉扬雄云：“书为心画。”清人刘熙载《书概》曰：“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奉信此一观

念。一个人的文章与书法就是一个人的心声和心画。作为从事书法学习创作和教学研究已有一个甲子时光的人来说，我深感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中国书法的源远流长。书法是小技、小道，但却是一门艺术，是中国人创造出来的一门关乎心性生命的艺术。作品本是艺术家的心性流淌与生命呼唤，又是其精神、情感、学养、性格的体现，因此书法艺术永远生机勃发。如果我们今天能更注重中国书法的艺术性、原创性、现代性，相信中国书法在世界艺苑中将大放异彩，风标独立。

谨此，我要感谢诸位师友、同道、同学，以及众多朋友们对我的书法艺术和书学理论所给予的认同和鼓励。

我要感谢朗朗书房董事长呼延华先生、编审党明放先生和王佳碧、田渊、钱午骏、王雨薇诸位优秀编辑所作出的努力和付出的辛劳。同时，还要感谢张爱国、鲁大东、郑一增、唐楷之、储楚、徐沛之、梁培先、王海明、夏冰、徐洁、陈惠、陈旭江等同学，为《王冬龄书法著编丛录》的出版，给予文字核校、图片提供等多方面的配合和帮助。

2015年8月12日
于杭州西湖畔

目 录

- 引言 001
- 清代隶书发展概况 003
- 004 一、清代早期
- 009 二、清代中期
- 013 三、清代晚期
- 清代隶书九家 017
- 017 一、郑簠
- 019 二、金农
- 026 三、桂馥
- 029 四、邓琰
- 032 五、伊秉绶
- 038 六、陈鸿寿
- 041 七、何绍基
- 044 八、赵之谦
- 048 九、吴俊卿
- 清代隶书的发展原因 053
- 054 一、金石考据的兴盛
- 054 二、篆刻艺术的发展
- 056 三、文人画的发展

056 四、广泛汲取其他书体之长
057 五、充分发挥书写工具的特长
059 六、解放个性，发抒性灵，具有创新精神
清代隶书发展的意义与影响 060
060 一、清代隶书发展是碑学之先导
061 二、清代隶书对其他艺术的影响
小结 063
图版 065
附录 223
主要参考文献 259
后记 264

引言

清代隶书的成就十分辉煌，它对清代及现代书法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隶书^①，孕育于战国，产生于秦，发展于汉，在东汉饰以波挑（又称“八分”），精研布白，本身的特点日趋完美而确立典型。因此谈起隶书，莫不以汉隶为宗。魏晋南北朝是隶、楷嬗变交递阶段，楷书逐步取代了隶书的正体字地位。所以这时期隶书拘谨而乏汉隶拙朴、纵逸、奇瑰的气象。后来各时期书体发展颇有侧重：唐代尚楷，宋代尚行，明代尚草，如一股股潮流，体现了不同时代的风尚。而隶书，几乎为人遗忘，尽管盛唐时由于帝王的偏好兴盛了一阵子，但唐隶体格过于丰肥甜熟，品味难登大雅，最终不过是昙花一现。唐以后，精擅隶书者更是寥寥无几，即如赵孟頫、文徵明这样的大家，其隶书也只是取法唐人，成就平平，无法与他们其他书体水准相比。直到明末清初，隶书才重新被重视。由于郭宗昌、郑簠、朱彝尊等人大力倡导，随着朴学的兴起，秦汉吉金乐石的不断发现，清季三百年涌现出一大批隶书名家。他们根柢汉隶，创造出有个性、有风格、有意境的隶书，开拓出新的风貌。在清代书坛上，可谓奇峰突起，巍峨屹立。

研究清代书法艺术成就，当然离不开对清代碑学的研究。碑学的产生，打破了帖学的垄断，给清代书艺带来无限生机。对于清代书法评价，正如清杨守敬所云：“国朝行草，不及明代，而篆分则超轶前代，直接汉人。”^②清代的隶书、篆书、魏碑体书确有自己的面目。隶书上承篆籀，下启北魏，故

①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按‘隶书’、‘左书’、‘史书’和‘八分’，都是同体的异名。”今从其说。

② 杨守敬：《学书迩言》，崔尔平选编、点校：《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714页，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

碑学书家，绝大多数擅长隶书。可以说，清初隶书兴盛实为碑学之先导。隶书贯穿于整个清代碑学发展之中，为碑学之关键。为此，拟就清代隶书作一深入探讨。

清代隶书发展概况

清代隶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人才济济，二是风格多样。

根据有关文献粗略统计，清代擅长隶书的名家有五百余人，笔者所见存其墨迹者（包括印刷复制品），亦不下三四百人，从皇亲国戚至布衣庶民，从名公巨卿至方外闺秀，从通儒学者至画家印人，论其身份可谓无所不有。

这些书家集古今书体之大成，极尽变化之能事：或取篆籀笔势；或运以行草笔意；或参以缪篆、魏碑、唐楷之法；更有熔真草隶篆于一炉者，非隶非分，亦隶亦分，以清人之意趣，合汉隶之神理，继承汉隶，改造汉隶，神奇变幻，不可方物。郑海藏云：“自隋以前，碑石书迹，无不相通，唐以降则一变矣，因隶意浸失故也。”^①可见，清代隶书是汉隶的复兴。不同的是，清人远宗汉隶，却没有一味摹拟，故能内质古而风貌新，体现了浓郁的时代气息，具有独立的意义，是继汉隶之后的又一高峰。

清代隶书的成就虽高，但全面阐述清代隶书的著作，还不多见。清桂馥撰有《国朝隶品》，将其所见的清朝隶书三十一家逐一作了品评（未见作品的还有十一家未评）；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国朝书品》，以分隶入品的有十一人；1930年沙孟海先生在《东方杂志》发表《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以书体分类，隶书列了六家。以上著者都是择其最富有代表性的书家加以评述。杨守敬、康有为诸家论书著作虽涉及清隶，但非常零星简略。因此笔者拟从时间顺序上，对在隶书上卓有成就的书家进行评述，同时，也力求勾勒出清代隶书发展的历史轮廓。

清代有近三百年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初（顺

^① 张谦：《郑海藏先生书法抉微》，2742页，天津，生流出版社，1942。

治、康熙）为早期；18世纪初至19世纪初（雍正、乾隆、嘉庆）为中期；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为晚期，与朴学发展分段相当。但各时期各地域习尚的变化非常复杂，还要考虑书家的影响及师承关系等等因素，因此，这样划分只是取其大略。

一、清代早期

清朝初年，满族统治者对知识分子采取了高压与怀柔相结合的政策，一方面尽量保存汉人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加以禁锢与限制，迫使文人不再去搞吟咏性情的诗文创作，而走上考证经史和金石研究的道路。在艺术上，就书法而言，虽然少数明代遗老仍善作草，但晚明那种“狂放不羁”的狂草之风，这时不得不收敛，代之而起的就是帖学的盛行。康熙激赏董其昌，乾隆偏爱赵孟頫，正因董赵字纤柔倚侧，不尚刚直，暗合其统治心理。清代的科举“尤以字体为重”，知识分子想要进入仕途，除攻八股文外，另外要练书法，须由帖学入手，达到整齐划一的馆阁体要求，否则难为金榜玉马之客。清初帖学风靡之日，正是碑学萌生发展之时。这时的碑学主要体现在隶书的发展上。当时许多人搜集汉碑拓本不遗余力，除了以资考经证史，还作为习隶的范本。像顾炎武这样的学者亦收藏汉碑旧拓甚夥，这给隶书艺术发展制造了条件。而郭宗昌、万经、顾蔼吉在理论上的提倡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郭宗昌（?—1652），字允伯，陕西华州（今陕西华县）人。郭氏工隶书，名重一时，并著书立说力倡隶书。王弘撰《砥斋题跋·郭徵君藏欧阳率更醴泉铭跋》中说郭氏：“至所自书分法直追汉人，不知有汉，无论唐宋，王孟津尝称为三百年第一手。”在《书郭允伯藏华岳碑后跋》中，王氏甚至说：“先生于书法各臻其妙，其昌明汉隶当与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同功。”其隶书不多见，风格与傅山相似，属奇诡怪异一路。而所著《金石史》论述汉碑极为精审。前人欧阳修、赵明诚、洪适著述汉碑偏重于考证，郭宗昌却能从艺术风格与特点上有所阐明，不蹈故辙，很有创见。